

## 纪念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 70 周年特别报道

### 探访红色村落 感受精神传承 ⑥



里庄村

1948年6月15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平山县里庄村诞生,里庄作为她的光辉起点,在中国新闻史上成为一个值得特别纪念的地方。在里庄的日子里,《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多篇重要文章,深入宣传中共中央的政治主张和方针政策,全面报道华北解放区和全国革命发展形势,为指导夺取解放战争全面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 《人民日报》的光辉起点

□本报记者 杨惠玲/文  
张晓峰/图

里庄村是位于平山县城西南的一个小村庄。因为与《人民日报》的一段红色渊源,这个小村庄在党的新闻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人们心中,这里是《人民日报》的发祥地,里庄有《人民日报》的根与魂。

### “大党报”诞生在这里

“那时候,人民日报社的工作人员分散住在村里的很多人家,编辑部就在我家的五间房里。”66岁的康贵起从《人民日报》旧址修复后就在这里看门,对当年的往事如数家珍,并为此很自豪。

1948年春,党中央、毛主席从陕北渡过黄河,跨过太行山,来到平山县西柏坡。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当年5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将晋冀鲁豫解放区和晋察冀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成立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

此前,毛泽东曾电刘少奇,就合并两大解放区的建议说:提议中央工委召集彭真、聂荣臻、薄一波、陈毅、邓子恢、康生、饶漱石到中央工委所在地开会,讨论你两区合并的提议,及支援整个南线北线的财政、经济、军工干部,成立华北局机构,成立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诸问题。这里所说的“大党报”,即指能够指导全局性工作的中央机关报。于是,一群年轻的新闻工作者,汇聚在里庄村,着手创办新中国第一张大党报——《人民日报》。

里庄村民风淳朴,当年是支前模范村,同时南有光禄山、西临治河、东接平原,易守难攻。从现址分析,里庄距离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约30多公里,但是距当时的华北局、华北军区所在的烟堡村2.5公里,距华北人民政府所在地王子村仅1.5公里,便于华北局就近领导,当属《人民日报》来到里庄的重要原因。

1948年6月15日,毛泽东题写报头的《人民日报》在里庄村诞生,张磐石任社长兼总编辑。《人民日报》的创刊号发布了华北解放区正式组成的消息,发表了社论《华北解放区的当前任务(代创刊词)》。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人民日报》从此时起,担负起了中央机关报的职责。

在里庄的日子里,《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多篇重要文章,深入宣传中共中央的政治主张和方针政策,全面报道华北解放区和全国革命发展形势,为指导夺取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庄、于明、萧航、萧风、陈进勇、陈柏生……这些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大都是在里庄村开始他们新闻生涯的。

### 报社和村民亲如一家

2011年修复的《人民日报》旧址就坐落在里庄的村头。此次修复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对邓拓旧居、译电室旧址进行了修复,第一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张磐石旧居、印刷厂旧址进行了仿制搬迁。旧址内的布展文物充实、资料翔实,展示了《人民日报》当年的艰苦创业史。青的砖、灰的瓦,还有墙上相框中一张张老报人的合影,泛黄的旧报纸,都默默地向人们诉说着报社初创时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走进邓拓的旧居,四合院里青砖灰瓦,屋内陈设简陋,角落里的水缸和土灶,似乎都在诉说着那段难忘的岁月。

从“中央要办机关报”到“两报会师里庄”,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和《晋察冀日报》合并”,到“华北《人民日报》里庄创刊”……旧址的展室内一张张资料图无声地讲述着那段历史。

在印刷厂的旧址内,一台“平版

印刷机”映入眼帘,康贵起说,当时一张张报纸就是用这台印刷机印制出来的。看着旧址里的油灯、排版桌等一件件旧物,康贵起介绍,这些都是报社在撤离时留在村民家中的,在修复旧址时,村民们都毫不犹豫地捐献出来。“我们家也一直在珍藏着的那块写有‘为人民服务’的木匾捐了出来。”

康贵起介绍,当时,里庄村民听说报社的同志要来,家家户户腾房子,像迎接亲人一样迎接《人民日报》的创办者。邓拓同志曾住在邢狗老家,社长张磐石住在李志安家,电台设在李高生家,总电台在康增祥家,总编辑室在康玉文家,拣字房在康绍光家,机关伙房在康家狗家,大伙房则在康对宝家。报社的印刷厂选在李祥妮家,东房印刷,南房裁纸,北房印成册文件。因印刷厂所占面积大,李祥妮便义无反顾地举家搬到了另一户人家去住。

里庄的父老乡亲们为报社提供了全部生活用品,炊具、炕桌、铁锅、水缸等生活用品一应俱全。另外,村民还保障着报社一定数量的粮食和蔬菜供应。很多村民主动为报社打杂、挑水、做饭,康保全在报社当过炊事员,李元元、邢连福还分别用木架骡车和马车给报社送过报纸。

194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从里庄村迁往北京出版。乡亲们对报社的同志依依不舍。

“不仅当年报社的同志和乡亲们像亲人一样,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始终都是一家人!”康贵起说,人民日报社已将旧址命名为“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每年新入职的编辑记者都要来到旧址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重温《人民日报》初创时期的光荣历史。近年来,《人民日报》的同志也多次回到里庄,还给村里的小学捐赠了电脑和学习用品等。

### 红色文化带动产业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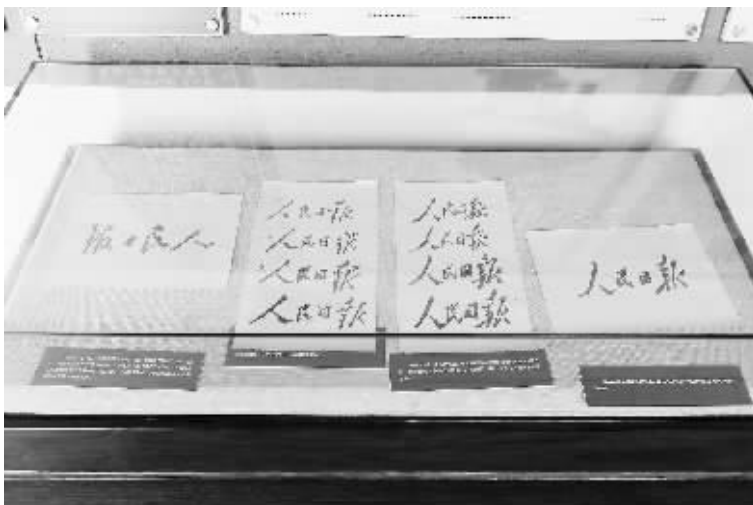
在党的惠民政策带领下,里庄村近些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得村民们对未来的美好生活充满了憧憬。

早些年,村前只有一条沙土路,沟壑纵横,一下雨就泥泞不堪。后来,土路变成了水泥路、柏油路,路面宽阔平整,与西柏坡高速相连,左可通西柏坡,右可达石家庄,方便了村民们出行,也促进了村里经济的发展。

勤劳淳朴的里庄人民,有的养羊、养猪,有的做豆腐、漏粉条,村民还有织粗布的传统技艺,村里还种植了苹果、核桃、芝麻、红薯、花生等。但由于环境闭塞,区位优势不明显等原因,村里的经济发展较慢。自从2011年《人民日报》旧址修复之后,成为通往巨鹿苑的一个红色景点,为里庄带来了不少游客。现在,



《人民日报》在里庄村创刊时的旧址。(资料图片)



毛泽东在西柏坡为《人民日报》题写的报头。



村里路面进行了硬化、垃圾进行了托管,村民的生活环境越来越好。

里庄村的《人民日报》旧址与王子村的华北人民政府旧址、光禄山风景区、巨鹿苑等已经连成一片。“游客多了,村里的特产也不愁卖了。”村民们说。

康贵起在自家办了一个农家书画展,同时制作一些书画产品作为旅游纪念品供游客选购。“近些年红色文化带动了旅游,《人民日报》旧址位于到巨鹿苑的必经之路上,我们相信会迎来更多的各地游客,用红色文化的优势带动里庄村的产业发展。”

康贵起告诉记者,村里现在有96名党员,大多自费订阅了《人民日报》,“除了学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最重要的是大家对这张报纸还有一种不能割舍的特殊感情。”



位于里庄村的《人民日报》旧址内的邓拓旧居。



## 茅以升三次考察赵州桥

历经1400年风雨的赵州桥,它的身上写满故事,且与众多古今名人结下不解之缘。被誉为“中国桥梁之父”的茅以升先生便是其中一位。茅老长期研究、热心宣传赵州桥,早在1962年3月4日就曾在《人民日报》发表散文《中国石拱桥》,将赵州桥盛赞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石拱桥。之后,文章又被选入初中语文课本,至今仍在沿用。

1963年3月,茅以升先生来到赵州桥考察。梁思成先生在1963年发表的《闲话文物建筑的重修与维护》中写道:“今年3月,有机会随同文化部的几位领导同志及茅以升先生重访了阔别30年的赵州桥……”下午4点多钟,他们乘火车到达石家庄,当天已经无法赶到赵州桥,只好下榻在石家庄的招待所,第二天乘省里安排的汽车前往……视察工作结束时,在桥头合影留念。

杨恩璞是摄影人,却与茅以升先生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说不同寻常,不仅仅因为他的岳父与茅以升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同窗好友,还有一层关系就是,他负责拍摄了纪录片《科学家茅以升》,并且在1980年同茅老一同来到赵州桥,这是茅以升先生第二次考察赵州桥。

杨恩璞深情地回忆当年的情景:“1980年夏,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接到当时国务院的批示,要求立即拍摄一批介绍国画大师艺术成就的专题影片,其中有:李可染、李苦禅、叶浅予、蒋兆和……我们为了表现蒋兆和先生的高超技法,在影片中设计了蒋兆和先生为茅以升现场写生的情节……”

在纪录片拍摄过程中,茅老向摄制人员吐露了他内心的愿望,那就是他研究和撰写《中国桥梁史》,希望再次亲临河北赵县,到现场参观和考察赵州桥。听到此事,摄制组就决定让科学家茅以升和画家蒋兆和一起同游赵州桥。

当时茅、蒋二老均已古稀之年,年迈体弱,但听到摄制组安排他们到赵县看古桥,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兴趣。说到这里,杨恩璞甚是得意,嗓音顿时高亢起来:“这就有了当年的赵州桥之行。1980年5月28日,我陪同茅、蒋二老从北京启程,一路上,茅老谈兴很浓,他说,石拱桥不但形式优美,而且结构坚固。赵州桥是世界著名的古代石拱桥。蒋兆和先生听到茅老这一席话,当下就有了想法,他决定,以恢弘的赵州桥为背景来构思创作茅以升的肖像画。1981年,蒋兆和完成画作,此画曾在中国美术馆展览。”

大约四年之后,也就是1984年10月,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茅以升到邢台市参加郭守敬纪念馆奠基仪式后,又特意考察了赵州桥,他参观考察赵州桥后在自己的题词前留了影。此后直到1989年去世,茅老再没来过赵州桥。

赵志勇



## 麦熟时节

20余年的乡村生活,我见证了一茬又一茬麦子的一生。我对麦子的喜爱之于稻子更胜一筹。且不说麦苗青青、风吹麦浪的千般风情,单从麦粒磨成面粉,再由面粉做成包子、馒头、煎饼这些美食的制作过程,简直就是一道诗歌的诞生。

那年秋天,稻子收割入仓,生产队开始分田到户。我家分到的六斗田,父亲精耕细作,种上小麦。寒露左右,麦芽像锥刃一样密密麻麻地钻出来,在深秋的田野里,等待一场雪。

那一年,天遂人愿,雪下得特别大,麦苗在冬天得到很好的滋养。立春后的暖风吹过,冬雪消融,大地一片春潮涌动。田野里的麦苗醒了,舒展如兰的青色叶片。麦苗的青,是那种浓郁的青,比碧玉更柔和,比翡翠更沉稳。麦苗青青,是农人在大地上书写的锦绣文章。

节气很快到了小满,田野里成了一片金色的海洋。父亲每天都要去麦地,看看麦子的长势,眼睛里流露出欣喜和迷恋的神色。灌浆的麦粒只欠一阵风了,当夏日的风被太阳炙烤成滚烫热浪,大步流星地从麦田的上方经过,一粒粒麦子的清香,随着风四处飘散,弥漫了整个村庄。麦子熟了。

镰刀挂在仓房的墙壁上,静静地等候了一冬一春,浑身闲得不自在,早已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开镰前晚,父亲喝了几杯自制的高粱酒,脸色红透。那晚月光皎洁,父亲坐在小竹椅上,往磨刀石上涂了一些水。月光下,他双手拿着镰刀,放在磨刀石上,弯腰一推一拉,动作优美流畅。推拉之中,锈迹斑斑的镰刀,变亮、变薄,在月光里泛着银光。

开镰的那天,大家都起得特别早。早上的麦秆因露水湿润,趁早割麦不易掉穗。金黄色的田野里,全村人像约好了一样,大人小孩齐上阵,到处都是人欢马叫,好大一个排场!父母在田里挥汗如雨,半晌午时,半块田的麦子已经乖巧地躺在麦地里。邻居李婶提着刚从菜地里摘的黄瓜路过,塞给我两根:“婶洗干净了,快叫你爸妈上来歇歇。”父母这才走上田埂,他们的衣服被汗水浸透,像狗皮膏药一样贴在后背上。吃着黄瓜,父亲还不忘了对母亲说:“我俩加把劲儿,天快晌午了。晌午太阳毒,麦子爱掉穗儿,咱们得抢时间……”

父母终于赶在正午把麦子全部割完了。一排排麦子整齐地躺在麦地里,神态宁静安详。一茬一茬的麦子,如同一拨潮水“哗啦啦”退去,一拨潮水“哗啦啦”地又上来。大地上,人其实和麦子一模一样。

打麦也要挑晴好的日子。把麦子在地里捆好,挑到场上,晒上一天日头,就要打场了。打场通常是在晚上进行,晒了一天的麦子,干燥易脱落。拖拉机拉着石碾,“突突突”地跑几圈,碾压过的麦子,顿时“身首异处”。捆麦秸、收麦粒、扬场,还不算堆麦垛,父母往往要忙到清晨鸡鸣打鸣才收场。整个环节,只要不下雨,纵然忙上一个通宵,也是幸运的,也是值得的。这些需要在自然之力掌控下的劳作,人的愿望显得极其渺小,也极易满足。

麦子的一生,从一粒旧麦开始,到一捆新麦结束。麦粒归仓,母亲会先拿一袋子,到村里的磨坊磨成新鲜的面粉。那散发着麦香的雪白的面粉,在母亲的指间魔术般地变成各种食物,诱惑着我的胃。

如今,我虽已远离村庄,但每到麦熟时节,就会想起父亲的麦地,想起像麦子一样生长的乡村故事,温暖着我的记忆。

赵玉明